

陈思和 丁帆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 | 研究书系

庄森 著



飞扬跋扈为谁雄

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陈思和 丁帆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 | 研究书系

庄森 著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飞扬跋扈为谁雄

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庄森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6. 6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陈思和主编)

ISBN 7-80186-474-3

I. 飞... II. 庄... III. 现代文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国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7320 号

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

印 张: 20.25 插页 2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86-474-3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陈思和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由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负责策划招标、并要求我去承担。其实我当时手头正在做自己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项目，无意再去承担这么一项任务，只是碍于南京大学董健教授、丁帆教授等朋友的情面，也出于本人担任了该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而一向无所贡献的惭愧，才勉强答应与丁帆教授一起来担当这项工作。但是一沾上这个项目，就觉得是湿手遭了面粉，事情越来越麻烦。其原因之一，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资料积累不多，不足以在此基础上作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文革”结束于今差不多有三十年，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意义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每年全国有上百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走上专业岗位。但奇

怪的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成果却甚少。据范泉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所列辞目,有关文学社团的1035条,文学流派的47条,其中不少流派也是有影响的“文人群体”,也应属社团范围,如以胡风为核心的“七月—希望派”。而在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领衔编撰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里,成书出版的只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不满十种社团资料集,连语丝、新月、南国这样一些重要社团也付之阙如;在90年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曾策划一套颇有规模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分研究、资料两种,但好像也只出版了关于《新青年》和《新潮》、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弥洒社、狮吼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几种资料(包括作品集和评论集),研究方面只有一本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论著,其他似都不了了之。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工具书,除范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和贾植芳、范伯群、曾华鹏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等少数几种外,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有关文学社团的整体性研究,除了关于创造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成果较多外,大多数文学社团都缺少专门的论述研究。倒是在相关作家研究中有一些涉及社团的资料积累,如周氏兄弟的传记研究中有语丝社的资料,徐志摩、胡适的传记研究中有新月社的资料,茅盾、郑振铎的传记研究中有文学研究会的资料,陈独秀的传记研究中有《新青年》的编辑情况等;此外在有关社团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这些资料和观点大多是局部的、零星的,并不是整体、系统的社团研究。这与当前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需要显然是不相称的。其原因之二,是项目内涵的扩大,现代文学不能仅仅理解为新文学,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准确理解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既然是“中国”,就不能仅以大陆地区为限,自1895年割让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地区,在文学领域都曾经产生许多文学社团,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大小古典诗社多达三百余个,可说是每一小村落就有一个诗社,这样一种壮观的诗社现象,如果不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真是谈不上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社团史;而且,既

然“现代”指的是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文学就应该包括新文学运动以外的各种文学社团现象,如南社,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文人社团,但由于它不属于新文学,在以往研究中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学视野以外。这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做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目前确实还没有具备成熟的条件。

这样一来,我们所进行的项目课题就有必要再作论证,从实际出发,完成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作为第一步,就是逐个地对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进行资料搜集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系列个案的研究。或者说,整体上的现代文学社团史暂时无法完成,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文学社团的“史”的梳理和书写,来综合成一套内容多样、各自独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的个案史。这就是目前我们编辑这套系列研究丛书的目的。在第一辑中,有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及以施蛰存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这七个社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栎社,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余的一种高雅消遣。第二种模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模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来的一个作者阵营,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在社团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审美倾向,因此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现代文学社团的模式远不止以上四种,如以政党意识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组织,还有纯粹的演剧组织,如剧社,暂时不在本系列研究之中。我们挑选了比较重要的文学社团为主要研

研究对象,在研究其发展过程中再连带出其他一些相关小社团,如语丝社带出了莽原社、未名社和狂飙社,等等。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社团与流派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所反映的文人群体面貌并不一样。前者研究的是社团的兴衰聚散,重点在人事;后者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两者混在一起研究,结果往往是流派因素压倒社团因素,理论概括压倒作家活动。这次我们组织人力撰写社团史书系,重点在人事,这是事先就规定好的,强调社团是如何形成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处的,社团与社团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展开的,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都作为我们描述的对象,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有一位专家在审读本丛书中的一本创造社研究论著时指出:“这本著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寻绎创造社这一风格独特的文学社团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历史,体现出一种精彩而务实的社团研究学术自觉。文学社团是由人构成的,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特质和各种复杂性都与人员构成密切相关。以前的创造社研究,主要从大致的理念和情感取向着手,对于创造社的内部人员结构、权力结构常常取模糊姿态,致使许多问题只能流于语焉不详,如创造社的方向转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创造社小伙计与元老派的实际关系到底如何,这本著作从创造社人员构成及其权力构成的角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创造社研究而言的,但也说出了我们研究每一个社团所希求的努力方向。

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征,每部研究著作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这里不再一一评说。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本书系坚持从资料整理着手,在确定写作要求和体例时,曾要求每本著作控制在二十万字以内,其中三分之二篇幅为社团史内容,另三分之一篇幅选载有关社团资料和编撰大事记,但最后的成果完成时,除了文学研究会一本在字数和体例上达到了要求,其他各部著作在字数上都超过了原来规定的要求,迫于出版社的篇幅限制,我们只好将各社团的大事记都删除,以保持篇幅上的统一。这些大事记将来再找适当的机会发

表。二,目前所出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书系的第一辑,第二辑的选题,如新月社、浅草社和沉钟社、大风诗社、七月—希望派作家群体等,也都在撰写的过程中,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把这些成果再次结集发表,使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陈万雄先生的著作《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朱寿桐先生的著作《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王晓明先生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都从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上给予本书系指导性的启发,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2006年3月27日于黑水斋

绪 论

《新青年》的作者群与编辑集体是否形成文学社团,现在国内外学界没有一致的看法,所以,没有学者把新青年社当作文学社团进行系统研究。

把新青年社当作文学社团进行系统研究,指出《新青年》的作者群与编辑集体形成了文学社团,是本课题的立足点。《新青年》第4卷第1号的出版,标志新青年社团的正式形成。这之前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卷是新青年社团的孕育期。从《新青年》第二卷开始,很多知识分子认同陈独秀的“新”青年思想,积极参与《新青年》发起的批孔和文学革命,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学主张,并以《新青年》为社团的核心刊物,聚结北京大学,结成新青年社团。新青年社团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文学主张的相同,并以《新青年》为阵地,最重要的结社条件是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利用北京大学的资源,提供了社团生存的经济条件和结社的行政权威。因此,新青年社团是以文学革命为共同的主张,以《新青年》为核心刊物,以北京大学文科为地缘基础,围绕陈独秀而结成的文学社团。北京大学文科是新青年社团的立身基础。陈独秀被变相罢免文科学长,离开北京大学,并将《新青年》南移上海后,新青年社团既丧失北京大学文科的结社根基,又失去社团赖以支撑的刊物,终于彻底解体。

第一节 课题来源及《新青年》研究现状

新青年社团研究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格局考察新青年社。新青年社团的组成方式、组织结构、运作模式,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任何

一个文学社团都不相同。本课题按照陈师思和先生的思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角度切入,以历史性关键人物陈独秀、胡适为中心,考察人与人、人与事、人与文学的关系,从事实本身及历史的原点出发,描述历史的过程,从人与事及其思想的复杂关系中探寻新青年社团的发生演变,揭示社团的孕育、形成、文学主张及解体的过程。本课题不是面面俱到解析《新青年》,而是在研究《新青年》的总体框架下,专注于以胡适、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社团的发生和迁延流变的过程,注重史的构架和宏观意识,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的整体格局中建构以胡适、陈独秀为中心的新青年社团史。

一、研究课题的来源

本课题是陈师思和先生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批准号:02JAZJD750.11-44008)”的子项目“新青年社团研究”。

新青年社团的研究处于空白的原因很多,但最突出的是政治上的原因:因为新青年社团的形成相对复杂,革命的、反革命的,进步的、保守的混淆在一起,学术操作非常困难。另外,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突出文艺斗争,甚至将文学史曲解成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文艺思想斗争史成了文学史家热衷的话题。新青年社团的历史更是被歪曲成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史。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青年社团的研究之所以还处于空白,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界对文学社团的认识尚存在各种疑虑,认为《新青年》的作者及编辑集体没有形成文学社团。另外,新青年社团的组成状况、活动方式及内外部关系都极为复杂,更涉及到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研究者没有具体、准确和系统的研究方法,找不到研究新青年社团的突破口。

《新青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源头,新青年的编辑集体又是新文化运动最为积极的推进者,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对《新青年》的研究奉行实用主义,只突出对现实有用的某一部分:或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或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或是从政治史学的角度研究,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某一单一学科内。本课题从思想

史、文学史、政治史相结合的视野入手,立足《新青年》的文本,以胡适和陈独秀为中心,描述《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的历史事实,力求全面、准确地解读《新青年》,并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全面地构建《新青年》的真实面目,揭示新青年社团的孕育、形成、文学主张及最后解体的过程。

新青年社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中的构成性地位,体现着新青年社团作为新文学的孕育者及呵护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形成现在这样的历史格局及学术格局,就与新青年社团的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直接相关。如果没有新青年社团的倡导并积极推动,新文学就不可能这么快诞生,并形成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如果没有新青年社团的运作,周树人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可以肯定,新青年社团的运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

二、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的研究现状

新青年社团的研究目前虽然仍是起步阶段,但研究《新青年》的成果颇丰。陈平原解读《新青年》独具眼界。陈万雄最先提出《新青年》是“同人杂志”,影响了《新青年》的研究格局。张宝明研究《新青年》也颇有建树。

20世纪80年代,贾植芳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把“新青年——新潮社”并列在一起阐述,认为“《新青年》集聚了一批思想倾向和艺术观念大体相近的新文学作者,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社团和流派”。而且还指出:《新青年》“在开拓现代文学新天地的过程中,随着刊物编辑部的扩大和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建立,逐渐吸引了一些新文学作者,形成了‘新青年’文学社团”。¹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只有对《新青年》文本内容的解读,没有具体阐述《新青年》怎样“形成了‘新青年’文学社团”,更没有对“‘新青年’文学社团”发展演变的具体阐述。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²是20世纪90年代后《新青年》研究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陈平原在文章里,从“同人杂志‘精神之团结’”、“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以‘运动’的方式推进

文学事业”、“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文化资本与历史记忆”，这六个方面来阐述《新青年》，认为《新青年》是“同人杂志”。陈平原说：“假如以‘同人杂志’来衡量，在正式出版的九卷五十四期《新青年》中，依其基本面貌，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主编陈独秀1917年春的北上与1920年春的南下为界标。因编辑出版的相对滞后，体现在杂志面貌上的变化，稍有延宕。大致而言，在上海编辑的最初两卷，主要从事社会批评，已锋芒毕露，声名远扬。最后两卷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颇有关联。中间五卷在北京编辑，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人的趣味与追求”。陈平原的阐述贴近《新青年》的原本面目，全景式解读《新青年》，是《新青年》研究的新标杆。

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源流》³，以《新青年》为立足点研究五四的新文化，其主要成就在于揭示出《新青年》及其作者队伍的构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并创造性地提出《新青年》是“同人杂志”，对《新青年》作者队伍的研究影响颇大。

张宝明研究《新青年》也颇有见地。张宝明的《现代性的流变：〈新青年〉个人、国家与社会关系聚焦》立足《新青年》文本，选择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梳理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张宝明的研究从四个方面研究《新青年》与“20世纪现代性演进的关系。首先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与‘旧’关系的转换，其次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自由与秩序关系的追问，再次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背后的历史真实，最后是这样一个人杂志对一个时代潮流的引领。围绕这些命题，笔者从思想史的研究角度进行了透视”。张宝明的研究，阐述了《新青年》对个人、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这一思想史最基本的命题。

朱寿桐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是国内外最新的专论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的专著，但没有专论新青年社团。朱寿桐认为，“《新青年》尽管也称‘社’，不过它的运作方式甚至它的表述语气都明显呈现出杂志编辑部的特征而不是社团的做派。例如在处理‘本社同人’与社外人员的关系问题上，《新青年》拿出的是非常开放的编辑部姿态：‘社外撰述，尤极欢迎’，即对社外人士的稿件分外倚重。这确实是一个编辑部的正

常态,一般来说不是一个社团常有的姿态”。朱寿桐还特别强调:“《新青年》表示尤为欢迎社外撰述,是欢迎社外人士提供正式的文章,这是一种编辑部特有的开放心态”。⁵朱寿桐的这种论点虽然非常有见地,但并不完全符合《新青年》的历史实际。“社外撰述,尤极欢迎”是《青年杂志》的“社告”,此时的《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先生主撰”,是陈独秀个人的饭碗,与新青年社团没有任何联系,而且新青年社团形成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刊登了一份编辑部《启事》,公开宣告“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⁶由此可以证明,《新青年》并不欢迎“社外人士的稿件”,完全是“一个社团常有的姿态”,绝不是什么“一个编辑部的正常姿态”。所以,《青年杂志》时期确实没有构成文学社团,但在《新青年》第4卷情况就已经完全变了。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是描述新青年社团的形成、发展及解体的历史,立足点是考察人与人、人与事、人与文学的关系,还原新青年社作为文学社团的历史面貌。因此,研究内容侧重新青年社团的孕育,新青年社团的形成,新青年社团的文学主张,并描述了新青年社团的最终解体。

一、新青年社团研究的内容

《青年杂志》是《新青年》的前身,《新青年》的发展史中为第1卷第1号至第6号,时间跨度为1915年9月15日到1916年2月25日。在《新青年》的影响史中,《青年杂志》虽是一个不甚重要的阶段,但在陈独秀的人生道路中则是重要的转折,是陈独秀迈向中国近代历史的中心舞台的极为重要的起点。在《新青年》的成长史中,《青年杂志》虽是蹒跚学步阶段,但却是新青年社团形成的第一块基石。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而是缘于一种谋生的选择。《青年杂志》沿用《甲寅》的办刊宗旨,套用《甲寅》的编辑思路,使用《甲寅》的作者,

以宣传青年文化为核心,侧重为青年的学习服务,提供可供青年选择的国外的新思想、新文艺,意在开拓青年的视野,向青年传授“修身治国之道”,实为青年文化刊物。

新青年社团能够形成,内因当然是《新青年》倡导的批孔与文学革命构成知识权威。但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外因。没有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位置,就构不成经济权威、行政权威,《新青年》的作者就不能集结在北京大学文科,最后形成新青年社团。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后,利用文科学长的权势,将《新青年》中意气相投的作者通过“行政权威”汇聚在北京大学文科,才能最终形成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北京大学文科为结社支撑的新青年社团。陈独秀能长北京大学文科,全缘蔡元培的协助。蔡元培为让陈独秀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煞费苦心,甚至为陈独秀编造了假学历和履历。

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旨在借助既深受西方自由思想熏染,又疏离现实政治体制的边缘知识分子来整顿北京大学的腐败。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以文科作为切入点,不仅因为改造理科需要大量的物力、资金的保障,更主要是因为文科教育关涉人的精神状态,并且有可能延伸到社会思想、文化习俗层面发生影响,这些都源自蔡元培“重学轻术”、完善人格的教育理念。蔡元培尔后又聘请由陈独秀引荐的刘半农、胡适、章士钊、李大钊等以传播西方文化思想为志职的知识分子进入北京大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的留学背景与其依据德国教育模式来整顿北京大学有会通之处,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些人给北京大学注入新思潮、新气象。蔡元培实施这种有鲜明取舍标准的用人方针,《新青年》的作者才有机会进入北京大学,新青年社团的形成才成为可能。新青年社团的形成可以说就是松散的同人在北京大学自然形成团体,完成组织形式的结社。

陈独秀利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行政权威和文科教授的经济权威,把《新青年》的作者逐渐安插进北京大学文科,既把思想主张相同的作者联结在一起结成团体,又让团体中的每一个社员都得到安身立命的岗位,非常完美地完成了新青年社团社员的集结。《新青年》作者刘半农,虽无学历却有文才,且变革主张激烈,先由陈独秀举荐进入北京大学任

教。胡适还在美国留学就由陈独秀推荐,为蔡元培高薪聘请,胡适博士学位没拿就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由陈独秀引荐,蔡元培聘请先后来北京大学文科任教的还有高一涵、李大钊,加上蔡元培、陈独秀来校以前就已在北京大学工作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以及稍后到来的周作人,《新青年》的作者云集北京大学文科,构成了北京大学文科的新生力量,推动了新文化运动,造就了北京大学文科的辉煌。从此,新青年社团和北京大学文科相互依存:北京大学文科因新青年社团的加盟而名声大噪,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新青年社团得北京大学文科的依托,不但解决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而且借北京大学文科“国立”的力量,把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主张付诸实践,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所以,新青年社团的核心社员既是《新青年》的骨干作者,又是北京大学文科的新兴力量。

文学革命是新青年社团的重要贡献。文学革命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为核心,给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以极大的影响和作用。在近代,陈腐的文学和僵死的文言文已严重不适应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的需要,严重阻碍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和新思想的传播,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以前较长的时间里,伴随资产阶级维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因势而起,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并没有突破整个封建文化体系。这样,一次彻底的文学革命成为文化革命的必需和首要的工作。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恰好顺应了历史的需要。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表示“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声援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将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推动成文学革命。钱玄同最先站出来响应文学革命,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构成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发表,标志着文学革命主张的基本成熟,既是文学革命的最基本的理论,也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文学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纲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的积极推动,尤其是周氏兄弟的加盟,新青年社团形成一

股强大的文学革命的历史潮流,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新青年社团的成员们认为,白话不仅仅是文学的语言问题,更是民族的思维变革的问题。因此不仅把白话作为文学的语言工具,更是把它作为民族的思想方式来倡导,通过创造活的文学语言来激活民族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替代文言的主张支撑了思想启蒙运动,通过语言形式的变革延伸了思想启蒙。因此白话替代文言的主张与思想革命互相依衬,构成双赢互补。新青年社团直接以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创造国语的文学成为新文学的主流。这不仅引起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以白话替代文言的深刻革命,而且是向统治阶级、传统文化及旧习惯势力的挑战,通过变革语言工具变革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变革文学的观念。

“人的文学”是文学革命主张的重要内涵,是中国文学从旧文学转折为新文学的关键。“人的文学”虽由周作人提出,但不仅是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也是新青年社团文学革命的核心理念,是新青年社团的“共识”。“周作人在1918年提出的‘人的文学’,主要还是以新文学运动代言人身份出现的”。⁷周作人以“人的文学”界定新文学的新内容,明确地描述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为新青年社团的文学革命理论建设做了突出的贡献,建构了新文学的理论支点。

新青年社团高度重视平民文学,并指出平民文学是新文学的重要源泉,提出创造为平民接受的新文学。平民文学主张的思想核心是个人主义。周作人认为人的文学也是平民的文学,平民文学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胡适从中国文学的具体现象入手,把中国文学分为古文文学和白话文学,强调古文文学只一味因袭、模仿,缺乏生气,是死的文学,因而不可能产生新的文学体裁。白话文学因根植民间,因而也主要表现为平民文学,是个人表现的冲动,不但紧贴生活,而且充分表现人的个性,能够保持自然的、活泼的生气,从而在不断的进化中产生新的体裁和风格。

新青年社团基于自由思想反对旧文学,倡导新文学。因为旧文学深受传统道德束缚,极为僵化和虚伪,扼杀人性,所以新青年社团主张新文学要贴近社会现实,运用写实的手法真实地反映生活,描述普通人的真实喜怒哀悦,彻底揭示社会现实的真相,批判社会的种种罪恶,宣扬新思

想新观念,创造具有独特个性的新人。胡适早在首倡文学革命时就特别指出,“惟写实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⁸胡适这样提倡写实的文学,目的就是让新文学贴近社会,贴近普通平民的生活,学习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反映民间疾苦,为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服务,培养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为此不但从理论上倡导写实文学,而且高度注意其主张的学理性,从中国白话文学的传统入手,寻找写实文学的历史实验,重构白话文学的写实文学的学理,具体阐述了写实文学的主张。

但是,新青年社团的社员因教育背景、政治理念的不同,从文学社团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思想分歧,只是由于都在北京大学文科担任教职,陈独秀具有经济、行政的权威,而且围绕《新青年》具有共同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主张,同时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都团结在陈独秀周围,思想分歧一直潜伏着,没有公开出来。直到1919年初北京大学取消文科、理科的机构设置,变相罢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行政权威、经济权威逐渐地丧失,而胡适的知识权威逐渐兴隆,于是新青年社团的权威中心逐渐转移,潜伏的思想分歧逐渐浮现。新青年社团先因“谈政治”的问题产生思想的分歧,后随着陈独秀的逐渐转向激进而开始出现思想的分裂,再因《新青年》编辑部的南移而产生编辑权之争,最后,《新青年》随着陈独秀思想的“左”倾“有特别色彩”⁹而被查封。新青年社团先失去北京大学文科的结社基础,又失去最后的联结纽带——舆论中心《新青年》,导致彻底分裂。

二、本课题研究的几个探索

本课题的研究是围绕着陈独秀、胡适的活动为中心而展开的,学术界研究这两位新文学的创始人的成果极为丰富,给本课题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和引导。本课题在研究中力图把这些历史人物还原为正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努力用接近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去接近他们和描述他们,为此在三个方面有所发现,并作为探索性的成果给以发表,以期得到前辈专家的指正。这三个方面是:一是指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没有什么政治企图,完全是迫于生活的无奈,抉择“以编辑为生”。¹⁰二是发现蔡元培为顺利聘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帮助其“整顿”北京大